

《诗经》弃妇诗与逐臣诗的文化关联

尚永亮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诗经》中的弃妇诗虽然在婚姻形态、人物特点以及所反映的被弃过程等方面不无差异,但在表现婚姻生活中妇人因难以把握自我命运而被弃一点上,却是相同相通的;由此形成男性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好色而喜新厌旧以及第三者为争夺一己利益进谗蛊惑等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在与之类同的弃子、逐臣诗中,一定情况下,妻的身份可以置换为臣、子,夫的身份也可以略同于君、父;夫妻、父子、君臣间类似角色的互通互换,既形成上古文化中的异体同构现象,也导致春秋时代解读弃妇诗时借夫妻以喻君臣、由本义向象征义作多元引申的阐释方式。至于此后屈原在骚体逐臣诗《离骚》中“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借男女以喻君臣,借弃妇以喻逐臣,则不仅构成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元的象征系统,而且拓展了弃妇诗的指称范围,深化了逐臣诗的意义内涵。

关键词: 诗经; 弃妇诗; 基本形态; 逐臣诗; 文化关联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摇摇文献标识码:** A **摇摇文章编号:** 1000-5919 (2013) 03-0030-10

摇摇与弃子、逐臣紧相关联,弃妇是中国历史上又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周易·坤卦·文言》释“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孔颖达《正义》进一步申言:“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①据此可知,妻道与臣道、子道一样,同属卑下的一方,与之相对的夫道与君道、父道,则属于尊上的一方;卑下者对尊上者只能应和顺从,而不能首唱。倘若卑不应于尊,下不顺于上,便有可能遭到尊上者的打击和抛弃。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界说,实际生活中大量事例说明,即使卑下的一方能够“应于尊”、“顺于上”,也随时可能受到尊上者的打击,沦落到被弃被逐的境地。《诗经》中的弃妇诗,便是典型例证。在《〈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一文中,笔者已对中国上古时期弃妇诗的三种类型做了辨析,下面,拟在此基础上,先就其中所厘定的典型弃妇诗的基本形态予以考察。

一、弃妇诗的基本形态与几个关键点

《诗经》中可以认定的弃妇作品,大致有《邶风》之《谷风》、《卫风》之《氓》、《小雅》之《白华》、《王风》之《中谷有蓷》、《召南》之《江有汜》诸篇。^②其中《中谷有蓷》之妇系因凶年饥谨而遭弃,其事稍欠普遍性;《江有汜》之妇弃因未详,且全诗文字过于简略,不足以提供充足的分析材料。其事既具普遍性,又描写详细而可供分析者,以《谷风》、《氓》、《白华》三篇最为典型。

《白华》反映的是发生于宫廷的弃妇事件,自《毛诗序》提出“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③的观点后,历代治诗者多无异议。因而,君主好色,宠新弃旧,听信谗言,变乱纲常,乃是造成申后被弃悲剧的根源,而抒发对进谗者和信谗者的愤懑,表现女主人公

收稿日期:2013-01-10

作者简介:尚永亮,男,河南长垣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摇摇《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② 摇摇参见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学术论坛》2012年第9期。

③ 摇摇《毛诗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上),第496页。

无辜遭弃的哀怨和痛苦,便成了《白华》的主要内容。^①

与《白华》相比,《谷风》、《氓》反映的是下层妇女的被弃事件,因而更具普遍性。此二诗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已婚妇女,而且都在被弃后离开了夫家,其“一伤其夫得新忘旧,一怨其夫始爱终弃”^②,在主题的鲜明性和内容的深刻度上均可作为分析的范本。

考察这两首弃妇诗,首先需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同一地区、同一旨趣的作品。邶、鄘本属卫国,其地歌诗多写男女情爱,常被后人目为“淫声”;而卫国统治者立身不正,颇有丑行,特别是卫宣公既通父妾、又占儿媳的行为^③,对当地的民风民俗产生了恶劣影响,以致民间弃妻之事屡见不鲜。大概有见于此,《毛序》谓:“《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这就是说,卫国的“礼义消亡,淫风大行”是与卫君的淫乱行为紧密相关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结果是“卫人化其上”,既导致了《谷风》男子的“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也导致了《氓》篇“华落色衰,复相弃背”事件的发生。就此而言,《毛序》在解释诗意的同时,还将诗的讽刺矛头指向“国俗伤败”的时风,为两首诗找到一个大的背景,应该是有眼光的。

这两首诗皆以第一人称的弃妇口吻和六章的篇幅叙写被弃遭遇,但在表现方式上又有所不同。《谷风》侧重弃妇的自我表白,夹叙夹议,其情感始终是沉重的。首章先以“不宜有怒”一句点明夫妻间的矛盾,二、三章即叙其被弃离开夫家的经过,并借“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宴尔新婚,不我

屑以”交待被弃的原因。四章回顾往昔,言己本有才德,治家勤劳,周睦邻里,并无遗行。五章写其夫于苦尽甘来之际,背恩忘义,“反以我为讎”、“比予于毒”。末章再次提及“宴尔新婚”之事,斥其夫“不念昔者”之薄情。全诗“反复低□,叨叨细细,极凄切又极缠绵”,令人“如闻怨声,如见怒色”。^④ 相比之下,《氓》更侧重叙事,首二章从夫妻相识、相恋顺序写来,将一对小男女一见倾心、私订终身、“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情景予以真切展示,字里行间充溢着期盼、欢愉之情。三、四两章借“桑之未落”、“桑之落矣”的比喻两相对照,写妇人在容颜、情爱盛衰前后所遭到的不同待遇,诗情陷入沉痛和苦涩。五、六两章进一步忆往思今,将当年为妇的勤劳和今日被弃后的失落和盘托出,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感怀中,展示了对负心男子的指斥和绝望。论者谓其“追往道昔,吻态如生,抚臆噬脐,情词并极”^⑤,可谓中的。

仔细分析两首诗,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一是被弃原因,二是被弃者的品德,三是被弃的过程和心态。

关于被弃的原因,《谷风》明言缘于“宴尔新婚”,即因丈夫另娶新欢,导致其妻被弃。但丈夫何以另娶新欢?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最重要者恐为故妻色衰,不如新人之容貌姣好。《郑笺》释首章“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曰:“此二菜者,蔓菁与菹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喻夫妇以礼义合,颜色相亲,亦不可以颜色衰弃其相与之礼。”^⑥自郑氏发为此论之后,历代评家多以为是,将华落色衰作为诗中女子被弃之因。《氓》诗对弃因虽未作明确交代,但从其“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殒”的比喻中,已可见其端倪。《孔疏》引申《毛传》之义解释说:“桑之未落之时,

① 关于《白华》各章的解说及其特点,参见尚永亮《上古弃子废后的经典案例与经典文本——对宜臼、申后之弃废及《诗经》相关作品的文化阐释》(《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兹不赘述。

② 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③ 参见《左传》桓十六年、《史记·卫世家》、《列女传》、《新序·节士》。又,《邶风》之《新台》、《二子乘舟》即讽其事。

④ 《怀东学诗》卷二引范处义《诗补传》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管世铭:《韞山堂文集》卷一,《〈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

⑥ 《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上),第303页。

其叶则沃沃然盛,以兴己色未衰之时,其貌亦灼灼然美。”“桑之落矣之时,其叶黄而陨坠,以兴妇人年之老矣之时,其色衰而雕落。”其后朱熹亦以“容色光丽”、“容色调谢”释此二句,由此几已形成一固定看法。此外,从诗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数语,又可推知氓或有因妻之色衰转觅其他女子的行为。明人何楷认为:“士贰其行”,此有所指,必氓别有私者。末二句又推本其德而言,所以无所止极如斯者,由其心德所藏不能专一故也。”^①倘此点可以认定,则氓妻之被弃,除色衰一因外,还与氓“别有私者”相关,只是相比起《谷风》中男子已然之“新婚”,氓尚处于感情出轨的进行态中。由此看来,男子薄情好色,二三其德,既是一种个体行为,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宋人李樗有见于此,联系卫君淫乱丑行解释道:“士之人不能正其室家,故下之人亦从而化之,如《谷风》、《氓》之诗是也。……夫人之越法犯分,惟其好色而已。人君好色于上,则下之人靡然而从之,至于华落色衰,故夫妇离绝,所以国俗伤败也。”^②这就是说,上行下效,好色成风,而这种因好色导致的夫妇离绝在《谷风》、《氓》中又可得到验证,因而,将此二诗女子被弃之因归为男子好色、女子色衰,应是大致不差的。

关于被弃者的品德,二诗有着详略不同的反映。《谷风》中的女子持身正直,德行敦厚。诗开篇即以“黽勉同心”、“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展示她对家庭、对丈夫的忠诚;在诗歌中幅,她又自述昔日作为:“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朱熹释其意曰:“言我随事尽其心力而为之,深则方舟,浅则泳游,不计其有与亡,而强勉以求之。又周睦其邻里乡党,莫不尽其道也。”^③由此看来,这位女子诚实、敦厚,且非常能干,无论治

家、睦邻,均堪称典范。与之相比,《氓》中的女子更为感性,更为直爽,但却少了些礼法层面的自律和严谨。婚前,她与氓无媒而通,表现出对情爱的大胆追求;婚后,她过度沉溺于情爱之中,以至被弃后有“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悔悟。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尽其心力,勤勉持家,承担了一位家庭主妇应尽的责任;而在对婚姻的态度上,她也是心无旁骛、欲从一而终的,这从诗中“女也不爽”、“及尔偕老”的表白中可以看出。总而言之,无论是《谷风》之妇,还是《氓》之妇,在婚姻生活中都是守了妇德的,都没有被弃的充足理由,^④而她们最后竟然被弃,这一事实本身,便形成强烈的道德反讽,凸显出男女性别上的不平等和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关于被弃的过程和心态,二诗表现亦有差别。《谷风》以“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迓,薄送我畿”勾勒妇人被弃经过,并展示其留恋、犹豫而又感伤、痛苦的心理。从这位弃妇的最初意愿看,她是要与丈夫“黽勉同心”、“及尔同死”的,因而在被迫离开夫家时颇不情愿,“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以至于迟迟不进;而其夫不念旧好,送她到门口即止,其薄情寡义,又令她深感痛心。虽然如此,但她对曾经多年生活的处所仍难以割舍,故告诫新妇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然而,转念思及“我身且不见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后哉”,遂于无可奈何之际断了心念。这里,人物心态曲折回环,欲留不能,欲走还休,“盖妇人从一而终,今虽见弃,犹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⑤至于《氓》中妇人被弃经过,则是通过前后对照展示的。诗首章有“送子涉淇”一语,提示女家与男家隔着一条淇水;四章以“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语紧承“桑之落矣”的比喻,说明这是此妇色衰被弃后乘

① 《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毛诗李黄集解》,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诗集传》,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④ 今人或依古之七出之法,谓无子为其被弃之由者。但细核此二诗文本,找不到因无子被弃的任何痕迹,故其说不足取。又,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二释《谷风》谓:“玩‘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此妇人盖有子而见弃。”其说可供参考。

⑤ 《诗集传》卷二,第21页。

车渡水返归娘家的情景。^① 倘与《谷风》之弃妇相比,《氓》之弃妇遭遇更有凄凉处:前者之夫只是“怒”,后者之夫已“至于暴矣”;前者遭弃虽被送不远,但毕竟还是到了门口,后者不仅无人相送,独自涉水归去,而且回到娘家后还受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待遇。按理,姐妹在夫家受到委屈并被遣归,自家兄弟应该同情、体恤才是,可这位弃妇非但没有得到理解、安慰,反而遭到兄弟的嘲笑讥讽,当此之际,其心境之痛苦、悲凉、酸楚可想而知。朱熹解释原因说:“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②话虽说得刻薄了些,但道理是对的。钱锺书将其命运与汉末《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相比,谓“盖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与焦仲卿妻之遭逢姑恶、反躬无咎者不同。”^③所析亦颇为深至,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大概正是因此妇“以私许始”,不合当时礼法规定,故面对被弃命运,亦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在饱尝各种冷遇之后,发为“静言私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伤怀之叹。用论者的话说,便是“《谷风》与《氓》二诗皆怨,然《谷风》虽怨而责之,其辞直,盖其初以正也。《氓》则怨而自悔,其辞隐,盖其初不以正也。”^④

二、由弃妇诗的主要特征看弃妇与逐臣间的异体同构

摇摇比较《白华》、《谷风》、《氓》三篇作品,虽然在婚姻形态、人物特点、被弃过程等方面不无差异,但在表现婚姻生活中妇人受制于其夫、难以把握自我命运、最终因色衰被弃一点上,却是相同相通的。从上文所列诸方面,不难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对丈夫有着强烈的依附意识。《白华》之妇自比为被人任意践踏的“有扁斯石”,形象地揭示了即使身为王后,亦地位卑下而难自主命运的事实;《谷风》之“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都是从妻子一方说的,她真诚希望丈夫能与己同心,共守道德,白头偕老,但这种愿望丝毫不具备约束力,丈夫可以听,可以不听,甚至可以“有怒”,可以另娶新欢,并随时将故妻逐出家门。这种情形,在《氓》中既表现为男子“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强梁任意,也表现为弃妇对“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沉痛自省。《郑笺》谓:“说,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过相除;至于妇人无外事,维以贞信为节。”夫与妇一有百行,一无外事,已自决定了其活动范围的广狭;而妇人视婚姻、贞信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态度,也导致其常为情困,很难摆脱对丈夫的依赖。钱锺书引明人院本《戡梭机》所谓“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之说,认为:“失情之所鍾,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耽不可说’,殆亦此之谓欤?”^⑤所说虽多从活动范围和心理角度着眼,但深层反映的,却是因不具备家庭话语权而形成的一种弱势心态。从历史的角度看,“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⑥这段常被引用的经典评说,似可作为理解

① 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句,《毛诗正义》承《笺》作解,谓弃妇追悔昔日“本冒渐车之难而来也”,细详其意,与文本不合;朱熹《诗集传》谓“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当为确解。《虞东学诗》卷二:“当如《集传》谓渡水以归,不当如《笺》说倒叙奔时也。”

② 《诗集传》卷三,第38页。

③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94页。

④ 《诗经通义》卷二引辅氏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94页。

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女性依附意识形成的理论依据。

其二,男子好色,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成为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氓》与《谷风》所反映的“士贰其行”、“宴尔新婚”皆缘于男子好色,已见前述;《白华》所谓“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揭示的也是周幽王惑于褒姒美色而废弃申后的行径。刘向《列女传》在指出褒姒“长而美好”,“幽王受而嬖之”后,更详细地记载了“幽王惑于褒姒,出入与之同乘,不恤国事,驱驰弋猎,不时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沉湎,倡优在前,以夜继昼。……忠谏者诛,唯褒姒言是从”^①的事实,由此见出幽王沉湎女色的程度。反观历史,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时代,维系整个家庭的,不只是妻子贤惠等内在美德,除此之外,还有妻之容貌等外在因素,不少情况下,后者所占比重甚至要远超前。韩非有言:“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②据此而言,女子色貌易衰,男子所求无厌,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而极少约束的丈夫屡屡为美色所惑,厌弃糟糠之妻,便既是其人性中很难改变的弱点,又构成一条自古以来屡被证实的弃逐规律。

其三,被丈夫宠信的第三者为争夺一己利益而进谗蛊惑,排斥前妻。在这方面,《白华》反映的申后被弃事件最具代表性。考申后之被弃,一方面固然与色貌有关——相比起年轻貌美的褒姒,早为人妻的申后自然缺乏竞争力,但从另一方面看,申后及其子宜臼的被弃被废,又与褒姒“身求代后,子图夺宗”^③的图谋和谗言惑君的行为紧密相关。正是由于褒姒觊觎皇后之位,并为其

子谋取太子的身份,故巧舌如簧,大进谗言,从而导致了申后被弃被废的命运。《大雅·瞻印》篇指斥褒姒“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小雅·小弁》从太子宜臼的角度一再申言“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均明确揭示出进谗和“信谗”是弃逐悲剧的重要原因。在《白华》诗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斥褒姒的进谗行为,但其一再申说的“嘯歌伤怀,念彼硕人”、“维彼硕人,实劳我心”,将“硕人”亦即褒姒视作自己忧虑的主要对象,^④已隐然透露出个中信息。至于《谷风》、《氓》二诗,虽然缺乏对第三者和利益争夺的正面描写,但诗中男子的“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何尝没有第三者拉拢、诱惑起的作用?《谷风》三章所谓“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乃是对新妇即将侵占自己利益发出的警告。宋人欧阳修指出:“诗曰‘毋逝我梁’者,《谷风》、《小弁》皆有之。《谷风》,夫妇乖离之诗也,其弃妻之被逐者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离之诗也,于太子宜臼之被废又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离之诗也,于苏公之被谮其语又然。然则诗人之语岂妄发邪?……《谷风》、《小弁》之道乖,则夫妇、父子恩义绝而家国丧,何独于一鱼梁而每以为言者,假设之辞也。诗人取当时世俗所甚顾惜之物,戒人无辜我废逐,而利我所有也。”^⑤这段话,联系到夫妇、父子乖离之际所用同一话语,一方面揭示出第三者、进谗者“宰我废逐”、“利我所有”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打通弃妇与弃子、逐臣间的关联,暗示了弃逐事件的内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用朱鹤龄从另一角度分析《小弁》的话说,便是:“逐子之悲,同

① 刘向:《古列女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0页。

② 韩非:《备内》,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③ 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上),第576页。

④ 播《白华》诗中四次提到“之子”,三次提到“硕人”。关于前者,古今注者多认为指幽王;关于后者,则有褒姒、幽王、申后三说。从诗意看,幽王既已由“之子”指代,就不应再被称为“硕人”;而诗是从申后角度写的,无论是申后所作还是他人代言,都无自称“硕人”之理;如此看来,“硕人”之所指以褒姒最为切当。“硕人”者,身材长大而貌美之人也。《卫风·硕人》有“硕人其颀……螭首娥眉”之句,即是对卫庄公妻庄姜之高挑身材和美貌的描写。所以郑玄《笺》云:“硕,大也,妖大之人,谓褒姒也。申后见黜,褒姒之所为,故忧伤而念之。”(《毛诗正义》卷十七,《十三经注疏》(上),第496页)

⑤ 播欧阳修:《诗本义》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摇摇摇，故其辞一也。”^①

以上三点，是弃妇诗内涵的主要特征，对之稍加分析即可发现，这些导致弃逐事件发生的要素，不仅表现在夫妻关系中，也同样表现在父子、君臣关系中。就所占地位言，与丈夫在家庭生活中持有绝对权力一样，在家族和国家层面，父亲与君主也持有绝对权力，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个人品性言，凡弃其妻之夫大都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易信谗言，而弃其子、逐其臣之父之君也多具此品性，诸如孝己、伯奇之被弃，即因其父殷高宗、尹吉甫娶后妻并信其谗言所致；宜臼、申生、重耳之被废被害被逐，也均源于其父其君专宠褒姒、骊姬，受其蛊惑而痛下杀手；所不同者，在夫妇关系中女子色貌所占比重较大，而在父子、君臣关系中，利益之争及随之而生的谗言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就事件性质言，与前述弃妇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依附其夫、德音莫违而被逐出家门如出一辙，多数弃子、逐臣也都品性正直、孝父忠君，结果却皆因群小谗言和父君信谗而惨遭弃逐。犹如描写宜臼被弃的《小弁》即屡屡申言：“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又如《小雅·四月》中的逐臣亦谓“我日构祸，曷云能谷”、“尽瘁以仕，宁莫我有。”^②至于那位时代稍后被视为古今逐臣代表的屈原，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③，在党人的嫉妒、谗毁和昏君的权力滥用中被逐荒远，行吟泽畔。由此可见，在被弃的过程中，无不伴有后母或佞臣等第三者为争夺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进谗活动。

进一步分析可知，在以上三点中，高度的权力持有是导致弃逐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由于持有绝对权力，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故无论在家庭宗亲层面还是国家政治层面，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君者都可予取予夺，唯所欲为，而很少受到道德、法律的限制，由此自然导致其私欲的膨胀，以致屡屡发生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爱听谗辞、排斥异己的行为；由于夫、父、君持有绝对的权力，为人妇、

为人子、为人臣者便不能不一再压抑自我人格，以恭谨、服从为第一要务，久而久之，这种服从便内化为自我心性的一部分，形成强烈的依附意识，即使无罪被弃，也只能发出悲怨的呼号，而难得反抗的行动；由于权力所在也就意味着利益所在，自然导致以色貌、谰辞取胜的第三者和夤缘附势的奸佞之徒纷至沓来，向夫、父、君大进谗言，誉邪害正，由此导致大量弃妇、弃子、逐臣事件的发生。

如此看来，夫、父、君和妇、子、臣虽身份各异，但角色类同，在其所组成的夫妻、父子、君臣这三对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极其相似的结构形态，即强势与弱势间的不均衡性及同类角色的互通互换性。换言之，其一为弱势、被动者，一为强势、主动者；一处于绝对地服从地位，一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一定情况下，妻的身份可以置换为臣、子，夫的身份也可以略同于君、父；在妻与臣、子，夫与君、父这些不同身份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同相通。这样一种人物身份的差异和结构形态的类同，我们称之为异体同构。

夫妇、父子、君臣间的异体同构，既缘于三者相似的结构形态，也缘于古人对此结构形态的认知以及理论上的阐发和凝定。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观念，其后孟子进一步阐发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滕文公》）在此基础上，西汉大儒董仲舒依据“阳尊阴卑”理论，在《春秋繁露》中将其系统化为具有绝对等级差别和道德规范性的“三纲”，亦即后来《白虎通义》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④在这里，君臣、父子、夫妻作为三种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关系得以确立，其中君主臣从，父主子从，夫妻从；处于主位之君、父、夫均属阳，处于从位之臣、子、妻皆属阴；属阳者尊贵，属阴者卑下，阴受制于阳，卑下者受制于尊贵者，遂形成千古不变的格局。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的就是“三纲”

① 摇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摇参见尚永亮《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子逐臣之作——〈小弁〉作者及本事平议》，《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小雅·四月〉本义考述》，《创大中国论集》第16号，2013年3月。

③ 摇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2页。

④ 摇《白虎通义》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等儒家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永恒性。

当然,如果细细分辨,夫妻、父子、君臣三种关系又是有所不同的。其中父子关系是前定的,不可改易的;而夫妻、君臣关系则是后定的,是可以更改的。^① 由于前者具有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结,因而,即使子被父弃,相互间仍然心存斩不断的系念,被弃者也存在明确的回归希望;而后者由于缺乏血缘纽带,故导致被弃事件更容易发生,发生后回归的希望也较为渺茫。换一个角度看,子的地位和属性是可以变化的,其由子而夫、父乃至君,由早期之阴而至后期之阳,存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妻、臣的地位和属性是不会变化的,即使夫、君亡故,他们仍改不了属阴的、依附于人的身份。就此而言,夫妻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间更多相似性,其异体同构的特征也就更为明显一些。

三、弃妇诗的多元解读及其在骚体逐臣诗中的意义凝定

摇摇由于弃妇与弃子特别是逐臣间具有如上所述的异体同构关系,表现在弃妇诗的解读中,必然会出现由本义向象征义作多元引申的阐释方式。从早期《诗经》接受史的角度考察,这种引申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由家庭向政治、由伦理向道德提升,一是由男女向君臣、由弃妇向逐臣过渡。

从第一个层面看,借弃妇诗句比况士人品德、节操及为政方略,在《左传》、《礼记》等书中即多有记载: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诗所谓‘戢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②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己怨。《国风》曰:‘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③

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观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当之。”^④

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⑤

这几则文献资料所引都是《谷风》、《氓》中的诗句,其中前二条用以说明士君子应出言谨慎、言行一致;后二条意在告诫为政者当与民同哀乐,不得与民争利。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以意用诗的简单比况,但在其内里,却已展示出用诗者在比喻、象征层面对弃妇诗的新的理解,以及由家庭、伦理转向政治、道德的一种诗义扩展。

从第二个层面看,用诗者将弃妇诗所表现的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挂起钩来,借以表现社会政治层面的用人之道和尊卑等级意识,也在春秋时代出现了。仍以前举《谷风》、《氓》诗为例,《左传》中就有如下记载: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⑥

这里所记是晋文公与辅佐大臣臼季(即胥臣、司空季子)围绕对郤缺态度的一段对话。郤缺是冀芮之子,而冀芮当年曾欲谋杀晋文公,乃是

① 钱锺书曾以兄弟关系与夫妇关系为例,认为:“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并引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小儿答夫妇、父母孰亲之问曰:“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管锥编》第一册,第84页)据此,则父子之亲远过夫妇之好,古人已有明言。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6页。

③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表记》,《十三经注疏》(下),第1644页。

④ 《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下》,《十三经注疏》(上),第1315页。

⑤ 《礼记正义》卷五十一《坊记》,《十三经注疏》(下),第1621—1622页。

⑥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十三经注疏》(下),第1833—1834页。

罪臣；在文公看来，罪臣之子是不能重用的。但白季却认为郤缺可用，原因有二，一是他曾发现郤缺与其妻相敬如宾，而“能敬必有德”；一是自古父子、兄弟功过“不相及”，明君不能因父有罪而迁怒于其子。为了说明这一点，故引“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诗句为证。这两句诗，本是《谷风》中弃妇向其夫说的话，其意盖如前引郑注所谓借葑、菲之根有美有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弃其叶，以喻夫妇不可以颜色衰弃其相与之礼^①。然而，白季却将这两句描写夫妇关系的话径直拿来，以喻晋文公与郤缺间的君臣关系，认为君主对臣下不应“以其恶而弃其善”，而当“取其善节”^②。这样一来，便隐然在夫妇与君臣、弃妇与罪臣间建立了某种定向关联。

与此相类，在鲁国大夫季文子与晋国使者韩穿的一段对话中，《氓》诗也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加以引用。据《左传·成公八年》载：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③

这里展示的，是关于汶阳之田归属的一段对话。汶阳之田本属鲁国，后被齐国占领，晋对齐用兵获胜后，便以霸主的身份命齐将汶阳之田归还鲁国。然而，时隔不久，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命鲁把汶阳之田交给齐国。对于晋国这种依仗大国地位不守信义、出尔反尔的举动，鲁国大夫季文子颇为不满，遂引《氓》诗“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诸语以斥之。如前所述，这几句诗本是弃妇指斥那位见异思迁的薄情丈夫

“氓”的话，但季文子引而申之，将鲁国及四方诸侯比拟为诗中的弃妇，而以情不专一的“氓”比附身为霸主却“信不可知，义无所立”的晋国，如此一来，便使一首普通的弃妇诗与国家政治挂起钩来，而弃妇与氓的夫妻关系，也随之转化为鲁国与晋国间的类君臣关系。对此一情形，杜预在注中有明确揭示：“妇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鲁事晋犹女之事夫，不敢过差；而晋有罔极之心，反二三其德。”^④换言之，晋依恃其霸主地位，将鲁这一弱势小国的利益完全不放在眼里，“七年之中，一与一夺”，其行为较之那位“二三其德”的“氓”还要过分；而鲁处在晋、齐之间的夹缝中讨生活，不得不听命于人，看大国的脸色行事，并随时可能被大国出卖，其地位正有如《氓》诗中的弃妇。就此而言，季文子引诗作喻，应该是恰切的，而支撑这一比喻的核心要素，无疑也是男女与君臣、弃妇与“弇臣”间的异体同构。

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弃妇诗内含的多元义项，以及引诗者所具有的自觉意识。固然，春秋时期流行“赋诗断章，余取所求”^⑤之风，特别是在诸侯国交往的政治场合及行人辞令中，人们常常“以意用诗”，摘取《诗经》中的某些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其间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然而，上述引诗者之所以征引弃妇诗而不引他诗，首先说明弃妇诗具有可供比喻、象征其政治意向的意义内涵，这种内涵在特定语境下可以较充分地表达言说者的意见。其次，这种意义内涵及其象征指向还具有广泛的文化通约性，即引诗者明白，听诗者也明白，社会上对之已形成一约定俗成的共同认识。复次，通过对弃妇诗的征引，可以更婉曲地表达引诗者的政治意图，使其言说更具技巧，而不是那么直白无隐、锋芒毕露。据此而言，前述《氓》与《谷风》二诗的被征引，便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一方面，诗中展示的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尤其是弃妇身份与“罪臣”、“弇臣”身

① 《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上），第303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杜注，《十三经注疏》（下），第1834页。

③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下），第1904页。

④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下），第1904页。

⑤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十三经注疏》（下），第2000页。

份间的相似性、同构性,不仅被白季、季文子等引诗者一眼觑定,在征引中予以强调,而且在晋文公、韩穿等听诗者这里,也心知肚明,无理解的困难;另一方面,借助比喻、象征的手法,引诗者得以隐约、丰富其义,既在表层一分为二,又在深层合二为一,由此大大扩展了言说的意义空间。

换一个角度看,以男女喻政治、喻君臣的赋诗言志行为,在春秋时代又限于对弃妇诗的引用,弃妇诗外,其他描写男女情爱关系的诗篇也屡屡被人称引,而且引诗者所表现的态度,并不限于对对方的指斥,在特定情况下,诸如表现依附、爱慕之类的情感也会借诗传递。以《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一段记载为例,即可看出这种情形: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羔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蟋蟀》。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①

这里所记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夫韩宣子(即韩起)饯行赋诗的一个片断。由于郑小晋大、郑弱晋强,为了向晋示好,兼言己志,郑六卿所赋者皆为《鄘风》之什,而除《羔裘》外,其余五篇又全是表现男女关系之诗。②其中《野有蔓草》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风雨》之“既见君子,云胡不爽”、《有女同车》之“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蟋蟀》之“蟋蟀在堂,倡予和女”,皆为男女相期、相悦之辞;借助这些诗篇,赋诗者鲜明地传达了郑欲与晋亲近、好合的意愿,而在象征层次上,男女关系便与国与国的政治关系关合起来。如果考虑到郑欲依附于晋以获取晋国支持的实际状况,则此种关系便又具有了一种内含等级差别的类君臣关系。至于子大叔所赋《褰裳》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则以诗中女子自处,表现了对爱慕对象的某种选择性。其意盖谓:你与我好,我自然与你好;你不与我好,我就与他人好。这层意思,韩宣子心领神会,故有“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的回答,直接将对方的男女之喻转换成了政治上对郑支持的表白。

当然,以上所说比喻义、象征义,多只是引诗者、用诗者的一种外在赋予,至于诗歌本身,虽已潜在的具有相应的意义指向,但诗作者却大多缺乏借弃妇比喻、象征其他人事的明确意识。真正具有这种意识并在诗中予以自觉表现的,应是数百年后崛起于楚国的大诗人屈原。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在《离骚》这一表现逐臣遭遇的代表作中,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③,由此构成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元的象征系统,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被历代评家反复称道的“男女君臣”之喻。在屈原笔下,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虚实结合,阴阳对应,获得了某种深层同一和定向联结。在表现形式上,逐臣诗有机地吸纳了弃妇诗的言说方式,弃妇诗则为逐臣诗添加了更为丰富的象喻功能;在内容风格上,弃妇诗以其女性特有的哀怨一定程度地柔化了逐臣诗的阳刚之气,逐臣诗则由于比喻、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而大大扩展了弃妇诗的指称范围,深化了其自身的意义内涵,从而营造出一种“朗丽哀志”、“惊采绝艳”的骚体诗风。由此,《诗经》中的弃妇诗以及春秋时期对弃妇诗、男女情爱诗的多元解读,经过逻辑发展,在屈原这里凝定成了自觉的创作意识和独特的表现手法,而骚体逐臣诗的代表作《离骚》也因此具有了空前的典范意义。

以上,我们就《诗经》弃妇诗的基本形态及其与逐臣诗的文化关联作了一个考察,大致勾勒了

①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七,《十三经注疏》(下),第2080页。

② 据《毛诗序》,除《野有蔓草》为“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外,《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蟋蟀》四诗或“思大国之正己也”,或“思君子也”,或“刺忽也”。然据朱熹《诗集传》,此五诗皆为表现男女关系之诗。今细审诗义,朱说不误。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早期弃逐文学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限于篇幅，展示 的类弃妇心态、象喻范式等问题，容待另文有关 《诗经》逐臣诗和疑似弃妇诗（如 《邶风·柏舟》）对 《离骚》的影响，以及屈原在骚体逐臣诗中 申论。

The Basic Form of the Poems About Deserted Wive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ir Cultural Relevance to the Poems About Expelled Courtiers

Shang Yongl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Wuhan摇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poems about deserted wives in *the Book of Songs* in such respects as their marital statu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being abandoned, but it is all the same in that these wives were often abandoned owing to their inability to hold their own fates in their marital lives. Therefo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poems about deserted wives consist in mens’ s absolute dominance, their fickleness in affection because of their lust for women, and the marriage wreckers’ s malicious false accusation for their self-interest. The characteristics mentioned above are also found in the poems about abandoned children and expelled courtiers. In some cases, the identities of children or courtiers could replace those of wives, while the identities of husbands were slightly equivalent to those of fathers or monarchs. Such similar role replacemen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father and son, monarch and his courtiers brought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allogeneic isomorphism i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times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that u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his courtiers as a metapho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extended from original meaning to symbolic meaning in a variety of ways, when interpreting the poems about deserted wiv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 Subsequently, in *Lisao* (《离骚》), a “Sao-style (骚体)” poem about expelled courtiers, Qu Yuan used a lot of metaphors imitating the ways in *the Book of Songs*. He used man and woman as a metaphor for monarch and courtier, and used deserted wives as a metaphor for expelled courtiers in this poem. These practices formed a richer symbolic system which expanded the range of reference in the poems about deserted wives, and deepen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oems about expelled courtier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poem about deserted wives, basic form, poem about expelled courtiers, cultural relevance

(责任编辑摇摇郑摇摇园)